

我與中山

鮑國順*

1980年中山大學在南台灣高雄市的西子灣建校，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。兩年後（1982），我應當時中文系主任龍宇純老師的邀約，從台中靜宜女子文理學院（今已改制為靜宜大學）來到中山，從此就與中山結下了不解之緣。當時家居台北，每週二開始整裝南下高雄授課，到了週五再北上返家，由於年輕體健，如此南來北往的日子，過得倒也逍遙自在，不覺其苦。1988年學校在校園後方的半山腰間，新建一批宿舍，宿舍的背面是山，正面是高雄港，人在客廳裡，可以望見港內的船塢，及船隻活動的情形。我因為年資較深，積點數高，所以分配到一間約四十坪的房子，隔週即邀請妻子人華南來參觀，夫妻倆對於這樣的環境，都覺得非常滿意，以為可以在此終老。幾經商量的結果，人華終於決定結束台北的事業，兩人帶著小女可軒，在那年暑假，舉家南遷，從台北人變成高雄人，當時可軒還不滿三歲。

本校校址的所在地——西子灣，原是台灣南部一處著名的遊覽勝地，其中除了有山林之美外，還有海水浴場、動物園，以及蔣中正總統當年留下來的行館。整個區域的面積雖然不廣，但是背山面海，優越的地理形勢，卻是不易得見。西子灣的西邊與南邊是台灣海峽與高雄港，東邊與北邊是壽山與柴山，山並不高，海也不遠，但是這樣的山與海，卻交織成了一幅極為優美的景觀。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，在山上佇足西望，就會發現這兒的落日，又紅又大，似乎與我們特別接近。平時海面上停泊著各種船隻，有貨輪、漁船，偶爾還可以看見幾艘軍艦與帆船點綴其間。因為高雄港主要是個商港，所以進出的船隻，是以貨輪為主，有人說，如果要知道台灣的經濟是否景氣，只要站在山上，看看高雄港外準備進港的貨輪是多還是少，就可以了解了。柴山位於壽山的西北角，兩山相連，實為一體。整座山東西寬約二公里，南北長約十公里，海拔三六二公尺，東邊緊鄰的就是高雄市區，都會區與山海遊憩區，如此的接近，實在少見，而本校能夠得到這塊土

*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榮退教授

地作為建校的校址，也算是福氣了。

自從中山大學決定在西子灣建校以來，在硬體建設的外觀上，絕大部份都是採用橘紅色的磁磚，包括行政大樓、教學大樓、圖書資訊大樓、學生活動中心、學生宿舍，以及教職員宿舍等，皆是如此。這樣的設計，不僅使學校令人有一種整體的感覺，同時也改變了西子灣的景觀，讓她在自然之美外，更增添了一分人文的氣息，可謂相得益彰。本校的規模，在首任校長李煥先生的規劃中，原來是以容納五千個學生的綜合性的中型大學為目標，西子灣的校地，約有四十公頃，正合於這樣的規劃。但是後來由於客觀環境的改變，特別是配合社會上的需求，學校的形態，不得不往大型的方向擴展，而四十公頃的校地，就顯得有所不足，因此，近年來尋找第二校區的工作，便成了校務發展的主要任務。但是再要找到一塊像西子灣這樣的地方，恐怕就不是那樣容易的事了。

本校自從建校以來，有許多措施，都是走在時代的前面，姑舉兩個例子，以見一斑。例如李煥校長深知人才是大學的命脈，因此在建校之初，除了禮聘名師碩學前來擔任各學術單位的主持人外，更放下身段，親身率領校內的教師，前往各個著名的高中演講，希望能夠吸引第一流的學生報考本校，藉以奠定深厚的基礎。此在十八年前，確實是一種破天荒的舉動。因為當時的大學數量有限，報考學生人數，常常是超出錄取名額的兩倍有餘，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之下，一般大學並不擔心招收不到學生。而且在幾十年的聯招制度影響之下，各校的排名早已固定，想要改變現狀，雖然並不是不可能，但是卻非易事，因此，各校都很少有大規模的改革動作。本校以新秀之姿，衝破社會大眾習慣性的思考模式，一時之間，不但吸引了眾多考生的注意，打響了中山大學的名號，更重要的，是改變了社會大眾對大學的觀感。寢假至今，各大學都已經注意到要提高學校的知名度，建立自己的特色，招收最適合的學生，而學生及家長，也都開始收集各校的資訊，作為選擇的參考，只要看看現今各種大學博覽會場上熱鬧的情形，就可以知道學校與學生的關係，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。對於這些改變，中山大學是有開風氣之先的功勞的。

其次，近十餘年來，由於政治鬆綁的關係，台灣社會充滿了各種不同於以往的聲音，自我意識尤其高漲，人人都想當家作主，而學界要求「教授治校」的呼聲，更是此起彼落，不絕於耳，「校園民主」頓時成了一股難以抗拒的風潮。本校因為建校不久，沒有歷史的包袱，教授群中，大部分又是剛從海外學成歸國，平均年齡甚輕，充滿了理想與改革的熱情，因緣際會，他們便成了推動「校園民

主」的急先鋒。猶記當時的校務會議，大家最熱衷的，就是在制定新規則，或是修改舊辦法。會議場上，多數代表發言踴躍，常常是討論了一整天，也無法把所有的議案都處理完畢，必須延到第二天再繼續討論，後來大家乾脆決議將每學期舉行一次的校務會議，增加為兩次，以滿足實際上的需求。其他的會議，大抵也是如此。當然，由於會議數量太多，開會時間又長，氾濫的結果，也難免使某些人視開會為畏途。但是，當時大家努力開會的結果，確實也改變了傳統由上而下的權威決策模式，成為由下而上的民主方式，校園文化，為之丕變。在本校校務會議所通過的各種法案中，以新定有關校長、院長、所長、系主任的產生辦法，影響特別深遠。在此之前，各公立大學校長是由行政院教育部派任，而校內各院、所、系的主管，則由校長聘任，所有的教授，對此都無置喙的權力。中山大學大概是所有大學中，最早制定院、所、系主任產生辦法的學校，其後，更進一步又制定了校長的遴選辦法。這兩項辦法最重要的精神，就是透過教師的普選，產生自己的主管。由於是大勢所趨，在本校制定上述辦法之後，很快便得到許多學校的回應，迄今不過十年左右，各公立大學，皆已競相採行，各校所定辦法的細節，容或不盡相同，但是由下而上的民主精神，卻是一致的。再者，中山大學的校務會議，也率先成立「議案考核委員會」與「經費稽核委員會」，以監督學校行政單位是否確實執行校務會議決議事項，與經費的使用是否合法合理，所謂「校園民主」，在本校可以說是充分得到實踐，這在中國教育史上，也可以說是向前跨進了一大步，凡此都令人印像深刻。

學術研究與學術活動，原是大學教師的本職，我個人因為曾經擔任過中文系、所主管（1990-1991）與文學院長（1991-1994）的職務，因此，在這些工作上，比起其他同仁，是較有表現的機會。其中有三件事情，尚值得一提。第一件事，是「清代學術研討會」的召開，由於「清代學術思想」是我個人學術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，而當時擔任本校中文系主任的戴景賢教授，對此也極有興趣，於是兩人便邀請系內相關同仁，如徐漢昌教授、鍾彩鈞教授等，共同研商，開始籌備開會事宜。經過眾人不斷的溝通與努力，「第一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」終於在 1989 年 11 月假本校國際會議廳順利召開，在兩天的議程中，共發表了十八篇論文，有一百二十位來自各大學院校的學者與會討論。事後檢討起來，覺得頗有成效，於是眾人決定每兩年開會一次，每三屆再擴大改開一次國際會議。多年下來，由於系上接任的主事者，如徐漢昌教授、王金凌教授、孔仲溫教授，以及系上同仁都相當支持，因此，迄 1997 年 11 月，已先後召開過五屆的「清代學術研討會」，

不曾間斷，其中 1993 年第三屆的會期，也如前議，擴大為第一屆的國際性會議。總計五屆以來，共發表一百二十一篇論文，網羅了台、港、大陸，以及新加坡、日本、美國等地的學者，共同參與。目前系上正在計畫將於 1999 年召開第二屆國際性的「清代學術研討會」。由於此一連續會議的召開，不僅使中山大學中文系成為清代學術研究的一個重心，而且也帶動了學術界斷代學術史的研究風氣。例如在本系舉辦「清代學術研討會」之後，接著便有成功大學中文系舉辦「魏晉南北朝學術研討會」、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舉辦「先秦學術研討會」、政治大學中文系舉辦「兩漢學術研討會」等，都有不錯的成績。

第二件事，是有關兩岸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學術交流。由於政治的因素，海峽兩岸的中國人，幾十年來，一直是處在隔絕的狀態之中，自從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以後，這種阻隔的現象，才逐漸鬆解，同時學術界也開始尋求彼此交流的機會。本系有一些同仁，認為本校與廣州中山大學，有其共同的歷史背景，如要交流，應該比其他學校來得容易。進一步來說，如果能由兩校的中文系先行來往，那麼在共同的歷史背景之外，又有共同的文化背景，同樣的研究內容，交流起來，理應更為容易，也更具有意義。就是在這樣的認知之下，本系於 1993 年舉辦「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」時，特別邀請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曾憲通主任前來與會，並且發表論文。此為兩岸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學術交流，可以說是奠定了一個良好的開始。次年春假期間，本校各院級的學術單位，共同組成一個大陸訪問團，參訪大陸的一些大學，其中廣州中山大學是重點之一。當時我正擔任本校的文學院院長，與中文系徐漢昌主任、孔仲溫教授，都是該訪問團的成員。三人在廣州中山大學，與曾憲通主任第二次會面，在曾主任的安排之下，同時見到該系的一些同仁，彼此相談甚歡，對兩系的交流活動，也交換了一些意見。直至 1997 年，因緣具足，兩系便決定正式以研討會的形式，進行學術交流，並將這項研討會，定名為「兩岸中山大學中文系學術研討會」，每年舉辦一次，由兩系分別在該校舉行。1997 年第一屆研討會，在廣州中山大學舉行，1998 年第二屆研討會，也已在高雄中山大學圓滿閉幕。兩岸中山大學中文系此種交流的方式，恐怕也是相當具有歷史意義的。

第三件事，是《中山人文學報》的出版。眾所周知，學術是大學的命脈，因此，本校在建校伊始，便曾出版有《中山大學學報》，以展現教師的研究成果。但是隨著學校快速的發展，各種系、所陸續成立，由於學術領域的不同，對於學報重視的程度，也就各有差異。大抵而言，人文社會所、系，比較重視學報，自

然理工所、系，比較重視專業的期刊，對於由學校出版的學報，反而並不在意。而且將各種不同性質的學術文章，集中刊登在一本學報之中，似乎也並不很妥當。基於上述兩個原因，《中山大學學報》在發行數期之後，學校便決定停刊，至於各院是否要發行自己的刊物，則由各院自行決定。1991年8月，當我出任文學院長之後，念茲在茲，便是希望為本校發行一種人文學報，此一構想，獲得當時林基源校長的鼎力支持，於是文學院同仁便在1992年4月，成立「中山人文學報編審委員會」，開始進行徵稿、審查、編輯等工作。到了第二年的四月，《中山人文學報》第一期，終於順利出版，算是了了我的一樁心願。其實，中山大學的人文研究，在近代史上，原是有其重要意義的。我曾在《中山人文學報》第一期的〈發刊詞〉上，表達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。當時我說：「在學術的領域中，人文學科的研究，是人類所以為萬物之靈的重要指標，因此一直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。而中山大學的人文研究，在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史上，實有無比重要的歷史意義。民國十五年，也就是中山大學在大陸創校的第三年，傅斯年由德返國，即受聘為文學院長，並兼任國文、史學兩系主任。接任之初，傅氏銳意興革，除禮聘當代名儒，充實師資陣容之外，更於次年創設語言歷史研究所，並出版研究所週刊，一時學風為之丕振。民國十七年，中央研究院成立，傅氏旋轉任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，在其領導之下，傅氏學風對此後中國的人文學研究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，此事固已眾所周知，無庸贅言。而其初志，實早已見於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時之作為，此自是本校人文學術研究極具光彩之一頁歷史。」緣此認知，所以我在推動本校人文學術的活動時，原本還是具有一種承先啓後的志願，而《中山人文學報》的創刊，算是其中比較具體而重要的一項成績。

我是在中山大學建校後的第三年才來到本校，雖然不曾目睹創校初期那種筚路藍縷，以啓山林的艱辛過程，但是在隨後的日子裡，畢竟也曾努力付出過，這的確是一段值得珍惜的情緣。日前再一次登上柴山的山頭，凝視西子灣的海景，我內心的感覺，與初來時仍然一樣，覺得這兒真是一個值得繼續在此努力的好地方。

2000年7月26日

